

傅斯年全集



第六卷



U52/173

傅斯年全集

第六卷

欧阳哲生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斯年全集. 第6卷/傅斯年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I. 傅… II. 傅… III. 傅斯年-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617 号

傅斯年全集

第六卷

*

责任编辑: 邹树德 李海棠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 印刷

*

787×1092 16 开 印张: 39 字数: 520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4000-7/G·3995

本套定价: 408 元 本册定价: 69.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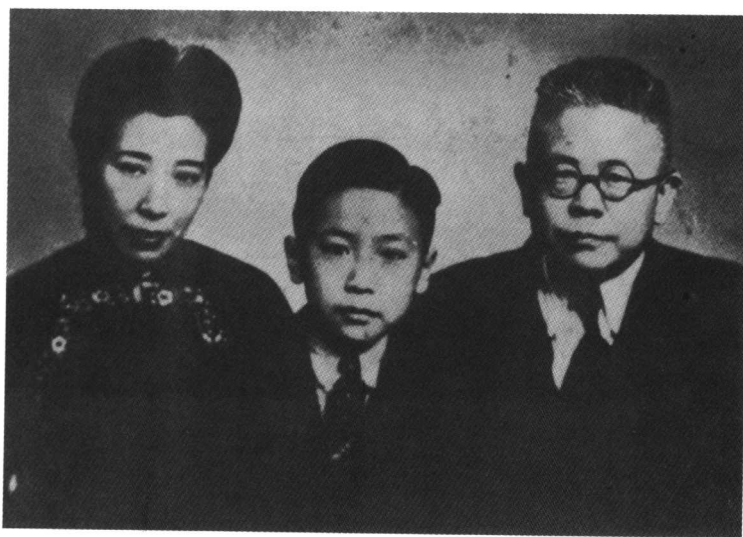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1947年6月，傅斯年先生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夫妇与母亲、傅乐成摄于北平。



1947年，傅斯年、俞大綵和儿子傅仁轨在南京合影。



傅斯年（右三）与罗家伦（右五）等同游时合影。

2008.8.07

1934年，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合影。
第一排（从左到右）：李济、王毅侯、王家楫；
第二排（从左到右）：丁西林、汪敬熙、□□□；
第三排（从左到右）：赵元任、陶孟和；
第四排：傅斯年。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告别北平北海时所摄。北海静心斋原为史语所办公处所。后排左一为傅斯年，左三为陈寅恪。

目 录

工作报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

1928 年

所务记载/3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9

附录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第一期/28

附录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31

附录三：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29年3月15日）

蔡元培/33

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45

历史语言研究所概况事务报告/50

1929 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57

1930 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一月）

/115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二月份工作报告/127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三月份工作报告/134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四月份工作报告/137

2 傅斯年全集·第六卷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五月份工作报告/142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六月份工作报告/150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七月份工作报告/155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八月份工作报告/158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九月份工作报告/161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十月份工作报告/164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67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十二月份工作报告/169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纂蔡子民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通告
(附提案) /171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173

附录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上届第一次所务会议
/274

附录二：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下届第一次所务会议
/279

1931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287

附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369

1932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375

1933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二年度工作报告/419

1934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三年度报告/451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编辑人附识/481

附录：《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撰文人共上
蔡元培先生书/482

1935 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四年度总报告/487

附录：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35年11月） 蔡元培/
504

1936 年

拟编纂各组专门著作目录办法案/529

附录：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各组编纂专门著作目录办
法/530

1939 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报告（民国二十八
年三月）/535

1942 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549

本所刊物沦陷港沪情形及今后出版计划/551

1945 年

附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向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的工作报告书（“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559

1946 年

附录：国立中央研究院1945年工作报告（“历史语言研
究所”部分）/565

4 傅斯年全集·第六卷

1947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九月）/569

附录：国立中央研究院1946年度工作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575

国立中央研究院1948年工作计划（“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578

1948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民国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七年二月）/595

附录：国立中央研究院拟定1949年度施政计划纲要/599

北京大学部分

1918年

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报告/605

1946年

三十五年度国立北京大学经常费概算表/611

三十五年度国立北京大学研究设备费概算表/612

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年度复员费追加概算表/614

1928 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

所务记载

(一) 造像征集启

自葡萄牙人东渐以后，法德南欧均有学者来中国；于是中国艺术遂为一时西欧朝廷所好尚。然当时欧洲人士但觉其与彼之异，不见其与彼之同也。百年以降，至日本者，见其造像偶有类于希腊之型，睹其器物或有近于波斯之制，于是古代文化迁流遂为人所注意。久之，若干可识之形，探流溯源，略窥一概。然日本佛教艺术实经由中土高丽而至，中土若于世界多元而合流之艺术大海中峭然孤立者，诚缘继体创作力量之强，历代更革变动之多，故体多亡，新体多异，遂于一切内来外出之痕迹多不可见。中国自汉以来，外国物事流入中国者，何代无有，而以六朝唐世为尤繁，艺术歌乐每以胡名，固不仅“木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而已。夫以亚历山大为名之城，见于班勇所记（乌戈山离），叙述印度日耳曼民族容体习俗，出于张骞所述，则知自西汉时中国已与希腊波斯文化区域及吐火罗等之先世有接触，后来历传必有影响，中国人只于此等事之流变，略而不注意耳。自法人福舍（A Fouehér）著论出后，欧艺东渐之痕迹显然；敦煌出壁丝画无

4 傅斯年全集·第六卷

量，于是一部中国中世艺术史，已有若干端绪可言；而德人格林韦都（Gruenwedel）及勒高克（Le Coq）依天山之行旅所得壁画等件，又于盛唐以前东来盛唐以后西去之迹，使人显然可睹。虽此两君著作有时过于作结论，有时又类幻想，然此种线络有甚多待寻之宝藏，可断言也。不知有此道路斯为墨守之愚，据局部之所得，扩为广溥之论，亦致卤莽之祸，大规模之搜集材料，诚此一线工作上至要之图也。盖中国艺术所包区域，万数千里（高丽、日本、安南及中央亚细亚之一部分），所经历时代，数千余年，其为多元，可以想见，如武梁刻石，飞动票姚，固不类后来造像，而巴蜀雕刻，频作别体，南北葬器，颇有异形，即如最近广州发现晋永嘉冢中之陶俑，其形疑类多岛域之初期艺术。若不先将存在材料群聚之，视其因时代之变迁，因地方之变迁，则识印竹于大厦，发燕币于美洲，单件孤证，徒滋误会者矣。兹拟由研究所分别委托人士，并请古物保管会之合作，先将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画等，为系统之撮拓及影照，并分别定其年代（其可能者），然后为一部分之工作者，可有详细之凭借，为比较之研究者，可得局促之资料，必能发启新知识，纠正旧空虚也。至于外国人士之合作，固所欣愿。兹拟办法如下：

（一）由本所助理员搜集一切刊印之材料，及在世间之拓本等。

（二）分别派人到各地撮拓及影照。

（三）请各地方人士或团体就近搜集。

（四）所中随时以卡片编此项目录。

所有一切造形，无论石刻金铸木雕泥塑，在明初以前者，均在征集范围之内。

顾颉刚、傅斯年提议

前件经议决，照拟进行，即为登出，藉作通启。务请各地方人士或团体代为搜集，或以消息随时惠示，俾敞所以著手，至荷高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启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

(二) 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

(一) 汉语方言

十六七世纪的中国人已经系统的知道古今音之差异，而这些系统的知道古今音差异的人中如顾亭林如江慎修，又清清楚楚看到方言的有变迁，则似乎在中国的汉语应该有个很好的基础了。不错，自陈第顾炎武起是有很多的成绩的，很多使欧洲人为他们的语学者深羡慕的，假如他们懂得我们的话。但照旧来的道路走，出来了不少的好结论，也出来了更多的好而待解又不易解的问题，也出来了些无谓的问题，和无聊的想法。考古的工夫做得很可观了，审音的工夫还不曾做；分韵类的工夫发达到了回旋的状态，单体方言的研究还不曾下手。由旧来的道路，虽然也有王念孙父子那样的大成绩，质言之，不朽的成绩，但到现在颇有成绝势的样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后我们的汉语学不得不以方言的研究为成就的道路。时间空间的观念是一切科学下手的初步，尤其是我们用历史的方法的人一时一刻忘不了的，所以我们对于汉语之研究正如植物学或动物学者研究一族的植物或动物一样，以调查取得分类之材料，以某一种方言之细密研究，认识其中各种机用，以相互的关系和古今的变迁认识其演化。中国古音之研究于汉语学之贡献恐怕远敌不上古生物学于生物学之贡献，因为化石到底有形可寻，汉语在古代声音的纪载太差了，待后来方言研究得好了，然后可以更认识古代给我们的那些不大记音的记载。所以我们现在要于汉语学的致力，左也是方言，右也是方言。诚然，中原音韵、平水韵、广韵，尤其是珂罗编伦发读

的广韵，辘轳使者的方言，《诗》、《易》、《楚辞》、汉赋、古乐府的用韵，都应是供我们参考乃至凭借的，但我们现在还是先来彻底的研究方言，以立我们理想上至坚实之根基。我们希望能用实验语音学给我们审音的工具，能以印度日耳曼等语系的研究结果，给我们一种借鉴，能以近来各类语言学中合理的窥测，给我们些提示，能为中国方言歧异的东南区域划成分县分乡的语言图，能解决在几种方言中音素音调相互影响以成变化的题目若干个，能辨出在几种方言中字的时代层次，能接触到些很广泛的题目，如现在南部方言有没有因与当地土著混合而成的现象，黄河流域语言在南宋时之急变是不是由于金元战争，并且能够破除若干不着边际的迷信如五方水土使音变迁等话，总而言之，我们要横着比较各方言，纵着探索某个某个方言所含的事实。

（二）西南语

西南各民族的问题实在是中国史上一个再重要没有的问题，固不限于语言，而西南民族语言之研究却是认识他们的物事的第一步。况且这些语言，西藏、缅甸、暹罗及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非汉族，都是属于印度支那语系的藏缅支或汉暹支的，^①是汉语的同族，汉语之研究，特别是古代汉语之研究，很靠和这些语言的比较。诚然，现在印度支那语系比较语学还不成熟、印度日耳曼语系比较语学之发达靠有两个已经很发达的古典语学，在印度早年已经很发达的梵语学，很多易于到手的北欧中欧方言等，印度支那语系之研究在现在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凭藉。汉语学既以方言未曾研究得好而不发达，现在学者对于藏语的知识更是死读自梵而番的译文。如叶希克辨别方言之工夫究竟还在甚初步的状态中。两种很古的语言已这样，那些西南山中倘惶迷离的语言更不必说。不过，这些语言，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都和中国有不少的关系，每种自身上都有研究的价值，藏语

^① 若干云南川桂的民族我们还不能认识他的语言的亲属。